

武锋 著

晏能清言，而当时权势，天下谈士，多宗尚之。



何晏
He Yan

大家精要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何晏

武锋 著

大家精要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 SK17N02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晏 / 武锋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7.7

(大家精要)

ISBN 978-7-5613-9119-8

I. ①何… II. ①武… III. ①何晏(?—249)—传记
IV. ①B2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05408号

何 晏 HE YAN

武 锋 著

责任编辑 彭 燕

封面设计 张潇伊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制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60mm×980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00千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9119-8

定 价 20.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 请与本公司销售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85303879 传真: (029) 85307864 85303629

丛书编委会

总 策 划：来新国 王文成

编委会主任：郭齐勇 周晓亮

编 委：来新国 陈知涯 张 彧 尹格韬 沈 众
王文成 孟淑贤 周长志 罗养毅 秦 丹
乌 琛

目 录

第1章 何晏与他的时代 / 001

大一统帝国的第一次纷乱 / 002

思想从一元走向多元 / 007

汉晋士风的丕变 / 013

第2章 少年得意贵公子 / 022

身世充满迷雾 / 022

曹操的“假子” / 027

教育与个性 / 034

婚姻生活 / 038

第3章 “黄初”无事与“太和”冗官 / 043

“无所事任”的二十一年 / 043

《景福殿赋》的深意 / 047

“浮华案”的真相 / 052

新思潮的涌动 / 057

第4章 有志革新的思想家 / 063

改革的背景 / 064

改革的内容 / 069

有大志而事难成 / 073

第5章 政治旋涡，覆鼎之灾 / 078

党争的激烈 / 078

进退维谷 / 083

最后的摊牌 / 087

何晏之死的另外解读 / 092

第6章 玄学祖师，清谈领袖 / 098

魏晋风度的起因 / 098

魏晋风度的发展线索 / 105

清谈领袖 / 109

奖掖后进 / 113

玄学祖师，自创新义 / 117

《论语集解》的贡献 / 124

古怪的癖好 / 130

第7章 身后千古名 / 140

褒贬任凭说 / 140

盖棺须论定 / 146

附录

年谱 / 152

主要著作 / 153

参考书目 / 153

第 1 章

何晏与他的时代

何晏（196~249），字平叔，南阳宛县（今河南南阳）人，汉魏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少有的能够自成思想系统别创一家的思想巨匠。何晏也是魏晋玄学的祖师爷和发动者。他精深细腻的思想体系、包容儒道的开放胸怀、富有逻辑的谈辩风格，都吸引了当时的思想界，并使他们深深为之着迷，引起了极大关注，对后世影响深远。甚至他的清丽姿容，他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能在当时引起轰动，成为一时佳话。在汉魏严酷的时代环境之中，何晏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并被当权者所贬低和诽谤。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去掉缠绕在何晏身上的灰尘与蛛网，一个活生生的何晏就站立在我们的面前。

俗语说“知人论世”。要想全面深刻地了解一个人，最好的办法是通晓他所处的时代环境，把具体人物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这样才能显幽烛微，进行历史与人物的双重把握。同时，对于以往的历史人物，应该多加一些“了解之同情”，

设身处地地体察他们的个人意志与行为举动。

大一统帝国的第一次纷乱

自从秦始皇于公元前 221 年建立秦帝国以来，一直到清朝灭亡，中间共出现三次大一统时期与三次大分裂时期，前者分别为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时期，后者分别为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辽夏金时期。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大一统帝国之后的第一个大分裂时期。何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何晏身处东汉与曹魏时期，先后经历两个王朝，共有四帝，分别为汉献帝刘协、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叡、齐王曹芳，如果算上有帝王之实而无帝王之名的曹操，那么何晏一生中有五个最高统治者。何晏在东汉与曹魏时期的生活，大约各占一半。很明显，何晏生活的时代给人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政局动荡、政权更替频繁，而何晏恰恰生活在这个乱世之中。

东汉中后期以来，汉王朝日益陷入无法挽回的堕落之中，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宦官与外戚的轮流专政，这种状况加重了政治与社会的双重危机。

东汉从光武帝到汉献帝，共出现十二位皇帝，享国一百九十六年，其中不到十六岁即位的皇帝竟多达九人，占总数的 75%，从汉和帝以下，皇帝均为幼年登基。汉殇帝即位时还是一个百日婴儿，汉冲帝两岁，汉和帝、汉安帝十岁，汉顺帝十一岁，汉灵帝十二岁，年龄比较大的汉桓帝即位时也才十三岁。皇帝幼年即位，就会给两种势力以可乘之机，这就是外戚

与宦官。“子幼母壮”，皇帝年幼必然太后听政，而太后作为妇人，不便也没有合适的机会出头露面，为了行使权力，就把自己的父兄引入朝，从而给外戚专权开了方便之门。有些太后为了揽大权于己身，特别喜欢立年幼皇帝，以便操纵股掌之上。有些甚至故意毒死懂事、稍微年长的皇帝，再立幼主。这就形成了所谓“孤儿寡母”的政治，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家国一体”的特征，是中国皇权体制之下独有的政治现象。

所以，南朝范曄的《后汉书·皇后纪上》评论说：“东京（洛阳）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帘，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祸速。……而赴蹈不息，焦烂为期，终于陵夷大运，沦亡神宝。”所谓“外立者四帝”，是指由外戚力量所扶立而登基的皇帝，他们是被汉和帝邓皇后家族所立的汉安帝，被汉顺帝梁皇后家族所立的汉质帝、汉桓帝，被汉桓帝窦皇后家族所立的汉灵帝；所谓“临朝者六后”，是指汉章帝窦皇后、汉和帝邓皇后、汉安帝阎皇后、汉顺帝梁皇后、汉桓帝窦皇后、汉灵帝何皇后。外戚专政的时候，控制了大部分的国家最高职位，皇帝成为他们行使权力的工具。

如和帝之后邓太后，不立长子刘胜，而偏立少子刘隆，刚立不久刘隆就夭折，后又立才十二岁的刘祐。邓太后连立两帝，把持朝政达十六年之久。皇帝幼年即位，太后势力坐大，外戚于是遍布朝廷，不学无术者多能得到高位，使得政治一团糟糕。

幼帝即位，被外戚所欺，不甘心权力被架空，因此也想夺回本来属于自己的尊荣。他们长年居于深宫，无缘结识其他政

治势力，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就是日夜陪伴在他们身边的宦官了。在这种情况下，幼主与宦官一拍即合，立即达成合谋夺回政权的意向。此类事情，对于宦官尤其具有吸引力。一则，事情一旦成功，他们就是佐命功臣，其所得荣华富贵远比做一个单纯的宦官强得多，再进一步通过控制皇帝就能上下其手；再则，宦官自宫服侍皇帝，大部分是被逼无奈，而他们一向又被人看不起，受到讥嘲白眼乃是常有的事情，这就在他们内心植下了仇恨的种子，总有一天要爆发出来。与幼主联手夺取权力，正好迎合了宦官的心理。如“跋扈将军”外戚梁冀因专权杀汉质帝，立十三岁的汉桓帝，桓帝又联合宦官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五人杀梁冀。宦官在支持桓帝反对外戚势力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

《后汉书·宦者列传》对宦官势力坐大有细致的描绘：“（阉人）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非复掖廷永巷之职、闺牖房闼之任也。……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从，上下屏气。或称伊（尹）、霍（光）之勋无谢于往载，或谓（张）良、（陈）平之画复兴于当今。虽时有公忠，而竟见排斥。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汉之纲纪大乱矣。”宦官帮助皇帝从外戚手里夺回政权，他们俨然以佐命功臣自居，借着皇帝的旗号树立个人的权威。他们握有赏罚大权，随便一句话就是不变的法律，他们的一举一动，在当时都能引起朝廷重大的变化，如果靠向他们就能飞黄腾达，但是如果违背他们就会被抄家灭族。东汉的皇帝有点悲惨，刚刚撵走了外戚这条狼，不承想又引进了宦官这只虎，狼虎前后夹击，皇帝的日子可想而知。

如此一来，东汉就形成了外戚和宦官的轮流专政，双方争持不下，都没有为国家服务的公心，反而只为个人私利而你争我斗，搞得东汉王朝更加乌烟瘴气。汉灵帝时期，外戚大将军何进想一举铲除宦官，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可惜他做事不够稳妥，不幸被张让、段珪、宋典等“十常侍”所杀。在外戚和宦官互相火并的情况之下，外廷士大夫以曹操、袁绍等人为代表，带领军队冲进宫中，全歼宦官，连唇上无须的人也被当作宦官杀掉。通过这种暴力手段，东汉王朝身上的毒瘤摧毁了。外戚与宦官的斗争以两者同归于尽而结束。

外戚与宦官的内斗还没终结，“党锢之祸”又惨烈上演，更加使东汉王朝雪上加霜。

面对外戚与宦官的斗争，一批正直的士大夫官僚还有太学生，激烈批评时政，抨击宦官之害。他们前赴后继，充分表明了士大夫的正义与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党锢之祸”有两起，第一起发生于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宦官党羽张成教唆其子杀人，被司隶校尉李膺（字元礼）处死，宦官派人诬告李膺，将士大夫的精神领袖、被称作“天下楷模李元礼”的李膺逮捕入狱。他们后来迫于压力释放了李膺，但终身不许他做官。在宦官的操纵下，桓帝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逮捕“党人”，后皆赦归田里，但“禁锢终身”，不许做官。第二起发生于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在大将军窦武、太尉陈蕃等人的努力下，党禁解除，窦、陈二人欲诛灭宦官，宦官则先下手为强，将窦、陈等百余人下狱处死，并规定“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都免官禁锢。“党人”推崇贤臣，反对宦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识。“党锢之祸”的发生，标志着士大夫反对宦官斗争的失

败，说明统治阶级的腐朽已达到了不能自救的地步。

正直士大夫反对宦官的斗争是可歌可泣的，他们的失败表明，东汉王朝已经不可挽救，力图通过内部斗争来变革东汉王朝的道路已经行不通，东汉王朝僵而不死，必须有新的力量才能给予它致命的一击。

这一致命的一击来自黄巾起义。公元 184 年，太平道张角在“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号召下，举起了反抗东汉的大旗。张角的反抗虽然最后失败，但是它加速了东汉的灭亡，为改朝换代打下了基础。黄巾起义之所以能够在东汉末年形成巨大声势，并且成为改朝换代的重要一环，其根本原因在于东汉王朝本身的腐朽。仅举汉灵帝“西邸卖官”一个例子就能说明很多问题。

公元 178 年，时当汉灵帝在位。据《资治通鉴》卷五十七记载，汉灵帝嫌国库空虚，自己的私房钱太少，因此想到了卖官筹钱的主意，这个筹钱机构建在“西邸”。当时的官职价格如下：二千石长官（相当于郡守等官）价格两千万钱，四百石长官（相当于县令、县长等官）四百万，三公价格一千万，九卿价格五百万。三公、九卿虽是中央官，但是因为大都是名誉性质的，没有实际油水，价格反而低于二千石地方郡守的价格。这可能是由于二千石长官掌握实权，有很多好处可捞。汉灵帝还进一步完善卖官法令：县令、县长职位的价格也要看所处县域的优劣而定，县域地势好、收入高，那么这个地方的长官的价钱就要高于一般县域的；买官者如果是富人，那么买官的钱必须一次性付清，买官者如果是穷人，那就可以先赊欠，等做官养肥自己之后再付钱给国家。汉灵帝“西邸卖官”，实

是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非常荒唐也非常可笑的一页。

众所周知，官僚队伍的好坏，关系到一个王朝的长治久安与否，汉灵帝竟然以官位为商品，就像市场上销售大白菜一样把官位出售给有需求者，而且还可以讨价还价，这表明东汉的官僚队伍已不能支撑东汉这座大厦。同时，买官卖官，这样获取职位的人，完全不会为老百姓真心做事，反而更加巧取豪夺，加紧搜刮，让人民的血汗抵消他们买官的损耗。皇帝的骄奢淫逸，官员的贪渎无能，更加引起人民的愤恨与仇视，如此看来，东汉王朝离走向自己坟墓已经不远了。

公元220年，曹操的儿子曹丕称帝，建立魏国，东汉献帝降为山阳公。此后刘备、孙权相继称帝，分别建立蜀汉、东吴政权，中国历史进入扰攘纷乱的三国时代。这是中国古代大一统帝国的第一次大分裂，而何晏正好跨越了汉魏两个朝代。

思想从一元走向多元

何晏生长在汉魏时代，正逢乱世，“乱”是那个时代最为鲜明的特征。除此之外，汉魏时代也是学术思想从一元走向多元的时代，是思想非常活跃，也富有独立色彩的一个时代。

对思想的控制是中国古代的特色，也是大多数皇帝喜欢玩的把戏。秦始皇统一天下，同样也不放松思想管制。他采取“焚书”“坑儒”的举措，对于思想方面的压制可谓空前激烈和严厉，甚至充满血腥与恐怖。但是，“坑灰未冷山东乱”，陈胜、吴广、刘邦、项羽等人纷纷举起反抗强秦的义旗，导致秦帝国大厦倾覆。实践证明，采取严厉的思想控制并不一定能够

取得良好的效果。西汉武帝充分看到了这一点，他采纳大儒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积极扶持儒学的发展，通过建立太学、五经博士等措施，把儒学发展与官僚仕进紧密结合起来。士子只要学习儒家学说，就能获得功名利禄，真正是“学而优则仕”，使得学术与政治打通，政治与学术相联。通过这些措施，知识分子被牢牢地束缚在儒家经学之上，失去了独立思考和自由批判的精神。他们的命运与历代王朝休戚与共，真正成为王朝体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西汉武帝通过利禄引诱，比秦始皇更加成功地解决了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不但紧紧地笼络住了知识分子，并且促使儒学成为官方所认可的具有无上权威的指导思想。武帝的施政措施对后世影响深远。

从西汉一直到东汉，因为有官方思想的引导和支持，儒家学说迅速占领了当时的思想阵地，士子的一举一动都以儒家思想为依归，并且拼命借助儒学挤进官方体制之内。儒学的影响一时无两，没有哪家有足够的势力与儒学争胜。儒学成为人们安身立命的所在。这里可以从几个侧面来看儒学成为汉代官方意识形态的情况。

首先，是从事儒学学习经生人数激增。西汉末期，国家太学生有三千多人，到了东汉洛阳，太学生人数暴增到三万，增长速度之快是非常惊人的。以上人数还只就国家首都地区的经生而言，没有计算地方经生。如果算上地方经生，那人数更是非常庞大。两汉时期，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儒学老师带许多弟子，他们的弟子再带弟子，如此延续下去，一个儒学老师就有百千弟子。所以，当一个儒学老师去世之后，弟子与再传弟子往往不远千里集聚起来为其送葬，这个队伍的人数上百上千乃

是常有的事情。这可见儒学教育之发达，也可以看出儒学对人们的影响之一斑。

其次，是研究与注解儒家经典的专家代代相传。这些专家一辈子埋首经书之中，勤勤恳恳，刻苦钻研，他们不但自己研究，而且还带动自己的子孙从事经学研究，这样慢慢发展下去，就形成了许多经学世家。比如，研究《尚书》的世家、研究《周易》的世家、研究《周礼》的世家，等等。经学研究出色就可以为官作吏，长此下去高官显贵往往同时也是研究经学的名家。这样，学术文化权力与官僚政治权力合二为一，累世经学与累世公卿合二为一，其结果是导致魏晋士族的出现，他们逐步掌握了大权，成为魏晋时期非常有特色的政治文化现象。

比如，弘农（今陕西华阴一带）杨氏一族，奠基人杨敞是西汉丞相。杨敞玄孙杨震是东汉光武帝时的太尉，被人称为“关西孔子”，以研治《欧阳尚书》而出名，杨震之子杨秉、孙杨赐、重孙杨彪，均官至太尉，作为东汉的“四世三公”而耀眼于政坛。不但如此，杨震子孙一直到西晋、北魏、隋唐，甚至宋朝，代有人才，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闪烁着异样的光辉。

再比如，汝南（今河南汝南一带）袁氏一族，以研治《孟氏易》闻名，东汉袁安官至司空、司徒，袁安之子袁敞及袁京都做过司空，袁京之子袁汤为司空、太尉，袁汤之子袁逢官至司空，袁逢之弟袁隗官至太尉、太傅。如果再加上影响东汉晚期政局的袁绍、袁术等人，其家族人才更是可观。汝南袁氏一族，四世中居三公之位者多至六人，史称袁氏一族“门生故吏遍天下”，确非虚语。

以上事例均可证明，两汉时期儒学已经成为官方指定的思想意识，占据思想界的主流地位，这一时期的思想是一元化的。当然，这里所说的一元化并非指其他思想都被消灭了，都不被允许发展，而是指它们与儒学的主流与中心地位相比是远远不及的。

但是，事情往往并非总能如人设计的那样发展。儒学被立为官方统治思想之后，因为受到当局尊崇，无人能撼动其地位，儒学思想开始慢慢地固定化，它以前的那种探索精神逐步衰退，当它攀向自己顶峰的时候，似乎也预示着它将要走下坡路了。儒学思想的体制化，使它不能进一步开拓，从而去顺应时代，这就导致它自身危机慢慢浮现。这些危机在起初并没有明显的征兆，但是越到后来，弊病就更加明显，到了东汉更是如此。

总体来看，这些弊病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儒学的烦琐化。儒学本身的经典早期有五经，后来有十三经等名目，这些典籍并不繁杂多端。但是，因为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很多人以此为生，他们不断对经书进行注解、疏通、诠释，导致儒家典籍的数量越来越多，远远超出了早期的儒学经典。儒学经典如此烦琐，它的很多思想更是人异其说，观点不同，争吵蜂起。人们费其一生，即使皓首穷经，有时也难以透彻了解一本经书。正如《汉书·儒林传赞》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藩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第二，儒学的神学化。统治阶级为了以儒学控制人心，想尽办法对儒家人物和儒学典籍进行神秘化。比如对

于孔子，统治阶级认为他是代天立言，为汉代作法，把他看作神仙一样的人物。对于儒家典籍，统治阶级制造谶纬，将之神秘化。“谶”是神秘的预言，可以显示未来的发展与走向；“纬”是相对经书而言的，纬书能够辅助经书，提高人们的认识，但实际上纬书大多荒诞不经，充满“怪力乱神”，完全把经书搞乱了。这说明，汉代统治阶级力图神化孔子与儒家学说，希望把儒学上升到“国教”的地位，力图完成对思想学术的全面渗透和控制。

随着东汉王朝的解体，统治阶级宣传的那些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被人们看到其中的很多欺骗性。又加上它本身的烦琐和神化，已经不能吸引很多具有理性精神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了。所以，从东汉中期以来，儒学之外的很多思想很快发展起来，知识分子不能在儒学那里找到立足之处，于是便向其他思想探寻。儒学的式微与衰落已不可阻挡。人们开始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文学、史学、道学、佛学、方术、艺术等百家之学，在其中寻求安身立命的道理，这样，思想一元的时代开始逐步退场，而思想多元，甚至思想激烈碰撞的多元时代开始到来。

自东汉，特别是其晚期以来，思想从一元向多元发展，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表现是士人不再以儒家思想为唯一的归宿，而是多方择取，充分吸收，以成一家之言。

这样的史例很多，如《后汉书·马援传》载马援的侄子马严：“专心坟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览百家群言，遂交结英贤，京师大人咸器异之。”《后汉书·延笃传》载南阳人延笃：“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又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师。”马严与延笃虽然通于经